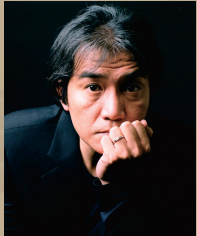


邱文傑建築師談建築設計教育



邱文傑

大涵學乙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設計顧問

訪談時間：2013/07/02

訪談地點：成功大學建築系

受訪人：邱文傑建築師

採訪人：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田偉源、張宸馨

Q1：概述您進入業界前，所受的建築設計教育（包含台灣、美國）？而什麼樣的事件或人物造就了您的建築特質？

我們那個時候台灣就六個建築學校，老六校那個年代的淡江建築系不像東海跟成大被認為是比較菁英的，淡江反而是非常自由且多元的，所以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設計老師都有，任何的設計都有可能在那邊發生。我覺得自由對於後來的人格養成倒不是一件壞事，可以讓你的彈性變比較大，也比較容易與人相處，其實在業界跟人生中，與人相處是很重要的。儘管它不見得直接跟建築教育有關。

而在大學的教育中，大四參加國際競圖、大五的畢業設計與出國留學等關鍵時刻對我後來的建築之路影響頗深。

我們那個年代剛好有幾個從國外唸書的老師回來，像是李俊仁老師還有季鐵男老師。季老師在1987年左右擔任我們的助教，帶我們參加日本新建築的比圖(JA Competition)，那時的題目是「A House for Year 2001」。為了做這份比圖，我們很用心地做研究；分析十年來的得獎作品，策略性地看這些案子。這些研究的過程其實相對是前衛的，因為這個比圖要求較概念的東西，更是鼓勵思考的，算是紙上建築的比賽，讓你來預測2001年未來的房子應該要是什麼樣子。沒有想到我們竟然能拿到第二名，這非常振奮人心。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影響很大，後來甚至因為有這個鼓勵，開始有出國留學的想法。

我的建築特質在那之前還是很傳統的，一直到大四這個關鍵的事件，讓我開始有點不一樣，好像和同學跳開了，在對建築的思考也有所突破，甚至進而在畢業設計時更成熟地操作，似乎擁有一種可以預測基地未來的能力，對環境有更敏銳的觀察。

而畢業設計像事務所一樣的氣氛也對未來執業有所影響，Rem Koolhaas說適當的世故是重要的，可以幫助你進到社會，幫你看見真實。

而和現在的台灣建築教育相比，在制度上其實是大大小小異的，我認為最大的差別在老師。

哈佛的建築設計教育對我來說則是現代主義的啟蒙期，像是一個極凍的過程；大學的時候對於建築的觀念或形式還沒有成形，到哈佛念研究所讓我一下子從後現代的台灣變成現代主義為主的學習環境。在我們學校的設計教學非常強調紀律的解構有一種自約或自律，對於畫出來的每一條線、操作的每個動作都得透過理性的思考判斷來做決定，如此大的差異甚至讓我在第一學期不知道怎麼做設計。

台灣與美國在對建築平面及空間的觀念其實是一樣的，最主要的差異在於形式，最後要拉成立體的東西的時候則是完全不同的。在哈佛也修許多現代建築理論課程，做了許多案例分析，特別用功去了解一、二十個現代建築的大師，研讀他們做設計的方式。現代建築的養分注入到血液裡面，逐漸形成建築的信仰，甚至定義什麼是建築。那段時間我就是在這種氛圍中成長，像是有了一類現代建築的種子，在我身體裡漸漸茁壯。

我就在現代建築的思潮裏面漂流著，在哈佛的學習有時也變成在地化過程的阻力，現在的我想要將這種限制慢慢地丟棄，開始去尋找現代性與在地性之間的平衡點，對我而言現在如何將這兩件事情中和是最重要的。我認為現代性已走到死胡同了，好像都被做完了，想在台灣做很真實、很在地的風土建築，和台灣的人文環境緊密相關。我仍不甘寂寞地，想為台灣的某種東西發聲，而那個東西如何與現代主義合流，那是我的挑戰。如何將自己身邊的事情，可能是很微妙很微小的事情，做出一個具有世界觀的、具有現代建築美學的東西，蓋出來的房子要看起來還是當代的、現代的，不是以前看的到的，但做法與材料也許很簡單，是植根於在地的，吸收在地的養分而成長的。

Q2：談談您執業生涯中的關鍵案子，或是重要的成長里程碑？

我在台灣早期的幾個案子中，包含新竹之心、921地震博物館、福興穀倉及C Pavilion，其中最關鍵的是新竹之心，而之所以關鍵是在於它是我第一個公共工程案，算是一個建築人進入社會的試金石。你想了一大堆，唸書唸了一大堆，還出國留學，可以透過第一個案子來實踐，跟社會碰撞來證明你到底是什麼咖，你到底在幹嘛，到底可以不可以。新竹之心也像是我的敲門磚，建築師跟社會互動的敲門磚。而最後證明是正面的，也讓我真的進入到執業界。新竹之心另一個重要的意義在於我在哈佛念的是都市設計，所以新竹之心很多想法是很都市的；我在市中心區做了一個地下廣場，然後再串連到整個都市，雖然規模不大，但卻有這樣的魅力。

第二個重要的案子是921地震博物館，幾乎代表了我對現代建築的禮讚。應該是說這個案子準備對現代主義說再見，把建築推演到跟地景、現代主義結合，是一個純粹在傳達理念的案子，也算是和土地密切相關，偏向藝術性的設計操作，乾淨且理性地結合人文地景與斷層線來形塑出一個雕塑品。這個案子的完成好像給了我的教育一個交代。到了福興穀倉就可以看出我開始強調在地的想法，開始想要打破理性。

在我的腦袋中一直有兩條平行的線：理性與感性。就像我共用的雙手，它們是一直在打架、互相衝突的。有些人做設計(像是黃聲遠及呂理煌)是比較感性的，他們先把自己的情感丟出去，然後再透過結構等實際的限制來收斂；我的做設計方法則一直深受美國教育的影響，非常理性的切入，到現在也是一樣。

Q3：事務所作為另一種教育場所，您如何經營自己的事務所、帶領團隊執行設計操作？

我很想把事務所當作教育的場所，我有一個小夢想，明年事務所會搬到外雙溪的堤防邊，一樓有個小工廠、二樓是公司、三樓是會議室，可以遠眺溪邊。小工廠裡面專門做模型、材料的研究與實驗，想把近幾年在嘗試的輕鋼架、圓管、L型鋼做得更成熟，有一天要用這些蓋房子，而且是很當代的房子。雖然這些案子都很小（指成大建築系的大廳吧台設計與設計學院入口等案），對我來說是用心的實驗，同時也在自我檢討。我希望真的有天能做到屬於在地、又有世界觀的建築，這是我自己下一階段要努力的地方。

我覺得理想的事務所要像studio、像學校一樣。不過在業界有其實踐的困難，不容易達到像學校這樣的環境。

印度孟買近郊的STUDIO MUMBAI註1目前是我的模範模型。這個團隊的組成有：建築師、藝術家、工人、結構技師、色彩專家、木工、水電工等等，是一整套生產線，也是一個工廠。他們不只做設計，也蓋很多精緻的木構旅館，今年也代表印度參加威尼斯雙年展。

這種公司的型態我非常喜歡，這是一支國際部隊：有巴黎來的色彩專家和你討論設計，有最在地的木工和你討論樁接等等，而建築師就像指揮家一樣，把大家串起來，一棟房子也就蓋好了，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

這種事務所型態也算是當代的趨勢。一種資本主義過度到社會主義中間的那段。說穿了我覺得這兩種主義都太極端了，我在找一個中間的夢土，大概就像孟買STUDIO，可以是很菁英的，同時也非常在地。這樣的團隊是多元、多樣的，交流的強度是很驚人的，也有很好的工作氛圍，我希望我的公司可以往這個方向去努力。

Q4：同時執業以及參與學校教育，有何影響或效應？

同時執業與參與學校教育是一種教學相長。開始執業後很容易一直磨練某個東西，很多成名的建築師也是這樣，越來越純熟卻容易忘了外面的世界，只是把自己的那套東西弄得越來越熟。但事實上這種眼界是很危險的。我覺得在教育界的好處是可以接觸到不同的聲音，國外回來的老師帶來世界觀、最新的思潮，這些是業界是沒有的，甚至看不起的，但是事實上這些一點都不無聊，是時代要過渡的現象。不論到什麼學校評圖，會發現對於建築有一些共同的價值，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壞的、哪些是有趣的、哪些是亂搞的，雖然很難說清楚，但是是存在的。在這樣的評圖中，和老師、學生的互動，對我來說是滿棒的，讓執業建築師不會變得太匠氣、僵硬，也能比較清醒地看到各種可能性。

Q5：對於現今的建築設計教育有何看法？理想中的狀態會是什麼？

我覺得設計、理論、實作要拉得更近，要能在很多層面實現。現在也有畢業設計作一比一的，或是模型做大一點，把平面、立面、剖面準確畫好，就是接近實作了。

近年評畢業設計，各個學校好像都很封閉、內聚型。交流不多，自己走自己的路。有時候我會希望這些學校跨校交流，這樣會更健康一點。現在的建築教育有點各自為政，也各有各的特色，但是少交流、交叉也就少多元性，所以依我來看，每個學校都變得好安靜。

我覺得理想中的狀態，工作和學習應該要很接近、沒有界限。理想中的案例就是STUDIO MUMBAI。STUDIO MUMBAI位於孟買近郊一個小村莊，蓋了四、五棟類似台灣的鐵皮屋，都是開放的，一群人在那邊工作，四周都是樹林，

像個小聚落，就在那樣的環境中，做出很精美的木構架或是輕鋼架房子，工作模式雖然是很菁英的，但是環境卻非常在地。

和同領域的一起做事是加法，跨界則是乘法，跨領域的人共同創作，如果做的很好，那是很有力量的，影響力會交叉，不會只是在單一領域而已。至於台灣的建築教育界會不會太狹隘，我有部份同意，不過我覺得這也是非戰之罪，因為建築門檻蠻高的，像是結構力學、消防、漏水、物理環境、燈光、美學等等，每個專業都是一輩子的職業，不像是fine art，用壓克力顏料、油彩來畫畫，就可以達到很驚人的狀態，它的技術面的牽制因素不高、經費也不高，音樂也是類

似。所以才說建築師五十才開始，有太多因素是你花一輩子去學習的，無可厚非。當你最基本的東西都沒有掌握的時候，你急著跨界，就會是個災難。所以我認為建築比較辛苦的是在這裡，尤其是把建築當藝術的，那注定是辛苦的。

不過我仍認為跨界是重要的，誰能夠濃縮那個時間，誰就厲害。建築專業的訓練其實是需要花較長的時間的，所以說建築教育窄，其實有它的必要性。建築是幫助別人，不是蓋了來成就自己，建築師是和社會息息相關的，不能獨立存在的。所以跨界，當然重要，就是要和別人在一起。

■

下期預告

建築改革

台灣的建築界從啟蒙至今，約已歷經了七八十年的光景。期間在許多業界及學界的前輩及團體的努力耕耘下，逐漸建立了目前正在運作的各種建築體制。然而由於內外在建築環境的演變，以及社會大眾對於建築界的期待日趨重要，而此正也突顯出了現今的建築體制似乎存在著諸多問題之窘境，致使誘發了更多建築人的關心，並共同尋求改善之道。

當然，這種現象不僅僅在台灣，其他國家也同樣地歷經了對於自身建築體制的各類改革運動。日本「建築計畫學」的創始人之一，同時也曾積極參與過日本近代建築運動的學者——京都大學建築系教授西山卯三（1911~1994）曾指出「所謂的『建築運動』就是『建築體制的民主化』之事」，在此過程中必須先找出體制的矛盾，進而透過群體的力量，面對體制加以改變。日本約從1920年代開始，就不斷地出現各類衝撞體制的建築運動，一直延續至今。

「建築改革」是進行式，也是深具探討價值的重要文本。而目前台灣的建築體制中所存在的問題極多，但如以議題區分，大致可區分成「建築專業與實務」、「建築教育與學術」及「建築文化與社會」等範疇。下期專刊預計邀請業界及學界的相關人士，針對「建築改革」不同範疇中的議題，進行剖析並加以論述，期望作為尋求共識及改善相關建築體制之參考。

■



曾光宗
中原大學建築系主任